

徐迟和梭罗:以《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中心

刘略昌^{1,2}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 200083; 2. 上海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之间的情缘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登湖》的时间跨度极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翻译认知,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次肯定的历程,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徐迟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态度之所以出现阴阳两重天的巨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政治和个人双重因素的制约下,译者对作者和原作本身的体悟有所变动。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后,晚年的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欣赏依旧,但更多时候徐迟是在借梭罗和《瓦尔登湖》来巧妙地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

关键词:徐迟;《瓦尔登湖》;梭罗;翻译认知

中图分类号: I1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5)02-0038-07

Xu Chi and H. D. Thoreau: A Case Study of the *Walden* Translating

LIU Lue-chang^{1,2}

(1. Center for Post-doctoral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Xu Chi has been maintaining a relationship with *Walden* by H. D. Thoreau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translation and retranslation of *Walden* by Xu Chi covers a long span, which has respectively gone through the founding of P. R. C.,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of 1950s, 1960s and 1970s,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the 1980s. Therefore, Xu Chi's attitudes toward *Walden*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is period, presenting a general tendency of spiral rising. In the late 1940s and the early 1950s,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Xu Chi redressed his appreciation of H. D. Thoreau and *Walde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Xu Chi still thought highly of *Walden*, but more often he used Thoreau and *Walden* as a medium to display his inner world.

Key words: Xu Chi; *Walden*; H. D. Thoreau;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收稿日期:2014-1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上海海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梭罗在中国”(A-2400-10-0120)

作者简介:刘略昌,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翻译研究。

梭罗是美国19世纪文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引人深思的重要作家”^[1],其代表作《瓦尔登湖》自问世之日起便在全世界各地广为传诵。近十余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生态批评的逐渐崛起,与《瓦尔登湖》相关的评论更是大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徐迟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和报告文学家,他翻译出版过不少的西方文学作品,其译作中最富盛名的当属梭罗的《瓦尔登湖》。徐迟是把《瓦尔登湖》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徐译本在中国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越来越为深远的影响。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认为,译作“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因为以新的面貌(译作)出现之后,作品就能与更多的受众进行崭新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徐迟的译介,梭罗的《瓦尔登湖》在时间(20世纪)和空间(中国)的意义上才得以极大地拓展,且有力地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原作是作者用以表达内心情感或再现某个时期社会生活的艺术结晶,译作是译者依据原作积极进行创造性叛逆的精神产物。尽管两者从文本样态来看存在较大的差别,但在探讨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时,“作者与译者的某种联系或两者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会隐含在讨论中。反之亦然”^[3]。许钧的上述话语表明,译作、译者、原作还有作者四方纠缠在一起,难以将其完全剥离开来。因此,在讨论《瓦尔登湖》的翻译问题时,除了遵循传统的研究范式,对译作与原作语言转换中存在的得失进行分析外,从文化层面入手对译者与作者(及原作)的关系进行解读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徐迟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情缘。早在1940年代末,徐迟即着手从事《瓦尔登湖》的翻译。1949年,徐迟翻译出版了“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之一的《瓦尔登湖》。进入1980年后,徐迟又先后两次对《瓦尔登湖》进行修订,并在译文前面补加了“译本序”。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登湖》的时间跨度极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认知随着时光的流逝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一、高山流水遇知音:1940年代末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的初次相逢

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的相逢,应该归功于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为了促进中美文化交流,1940年代末供职于美国新闻处的费正清提议:中美双方可以考虑合作搞一套“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徐迟所译《瓦尔登湖》就是这一比较完整而又系统地介绍一国文学代表作之成套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共计18种,20卷,其书目“都编列书号,安排先后,具见匠心……文学各个部门都有了代表作”^{[4]305},这样一套洋洋大观的丛书“可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4]306}。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是该套丛书中唯一的一本散文著作,由此可见策划方对梭罗这部杰作的重视程度。

根据徐迟的回忆,策划“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以及选择拟译书目时,尽管美国已经涌现出了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和赛珍珠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特别在专搞外国文学学者的圈子里,美国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4]306}。在这样的局势下,拟定并翻译一套高质量的美国文学丛书,使其对我国读者认识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风貌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并非易事。徐迟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此说道,“我当时不大相信,这样大的丛书计划,恐怕不容易编制出来”^{[4]303}。毋庸置疑,作为异域文学之美国文学的蓬勃发展与当时国人对其认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但在此之前徐迟就推出过《圣达飞之旅》《我轰炸东京》《帕玛修道院》等译作或译著,因此徐迟对包括美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态势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徐迟说道,当时“在重庆,我算是一个研究外国文学

的人,龚澎他们在和美国人接触谈美国文学时,是把我作为咨询人的”^{[4]306}。在徐迟这个顾问看来,当时要想系统地译介美国文学,应该首先考虑霍桑、爱默生、爱伦·坡、梭罗的《瓦尔登湖》还有麦尔维尔的《白鲸》等^[5]。应该来说,选择翻译《瓦尔登湖》不是徐迟一时的心血冲动,而是他在经过认真思考和甄别之后作出的最终决定。在徐迟看来,梭罗是美国的代表性作家,《瓦尔登湖》也站在了美国散文作品的巅峰之列。翻译这样一部作品,自然有助于推动中美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

徐迟翻译梭罗的《瓦尔登湖》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在讨论译者对译本的选择时,如果一味夸大译本选择受时代特征和时代需要的影响,实际上强调的只是外部环境对译者选择起到的作用。外因固然重要,但外因最终还得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翻译家的选题除了反映时代的需要和翻译家的社会责任感外,还体现了翻译家的个性特征和审美趣味。“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在译者和拟议作品之间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具体译什么由译者自己选择,这种“‘认译’方式又保证了译者的爱好与长处相结合”^[6]。其实,早在与美方进行初步沟通时,徐迟就说:“他们问我想要译什么书?我说,曼尔维尔的《白鲸》(Melville: *Moby Dick*)或梭罗的《瓦尔登湖》(H. D. Thoreau: *Walden*)这两本书中一本”^{[7]408}。

至于徐迟为何最终舍弃麦尔维尔而选择了梭罗,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傅雷曾深有体会地写道:“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8]。梭罗之于徐迟,在某种程度上大有“高山流水遇知音”“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在回忆当年翻译《瓦尔登湖》的时候,徐迟感慨万分:

和一位美国作家,名叫梭罗(Henry D. Thoreau)的,一起徜徉吟咏于华尔腾……虽然身子没有去,心灵可以说已全部贯注在湖里面了。这本书有很多片段很动人,很美妙。精辟之句,令人拍案而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爱这本书……觉得越译它,它越发美丽,佳妙,真切,深沉,有无穷的兴味^{[7]491-492}。

解放之前,我国政治动荡,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密切关注时局的徐迟却也能够为“瓦尔登湖”魅力所打动,从而沉潜于其中,《瓦尔登湖》这本书对徐迟的吸引力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徐迟认为《瓦尔登湖》这本书很精彩:“这是一本光明的书,也是一本启示录。整个夏天,我就沉浸在这中间,舞文弄墨的同时,在瓦尔登湖的湖水中,过得很宁静,很满足”^{[7]493}。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徐迟的确是体悟到了梭罗《瓦尔登湖》的深奥所在,所以才会觉得《瓦尔登湖》思想深刻,文字绝妙,内里蕴含着一种别样的美:“这书这样美,译它也是一种享受,会感到愉快的”^[9]。

徐迟不仅在翻译过程中感到心满意足,而且早在初识梭罗时,就已经一见钟情了。对此,冯亦代的追忆文章可资为证:“屈指算来,离故友徐迟企图要翻译梭罗的《瓦尔登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想到当年在重庆他首次读完梭罗原作(指《瓦尔登湖》),兴冲冲从他的草堂来到近在咫尺我的宿舍时那幅激动样儿”^[10]。从初识梭罗到顺利完成《瓦尔登湖》的翻译,徐迟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激动,这一是缘于促进中美文学文化交流的重大责任感使然,二是因为徐迟的确在梭罗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共鸣,感受到了“这湖水和这文字都太纯洁”^{[7]492}的魅力。

二、羞于见人的“毒草”:建国后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认知遽变

1949年3月,《瓦尔登湖》的中译本(当时译名为《华尔腾》)终于付梓出版。不过,当时适逢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全国上下热闹欢腾,人人莫不沉浸于巨大的喜悦当中,因此注意到这本并非热热闹闹的书的人很少。文革期间,由于“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牵连,许多译者都受到了无理的审查,全套丛

书甚至被批为一棵“大毒草”^{[4]310}。徐迟因为参与“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策划出版,因为译介《瓦尔登湖》与费正清有过接触,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费正清的关系也自然成了主要审查内容:“革命小将一个劲地审问我是否是美国的文化特务,后来平反了”^{[4]310}。无论是翻译质量,还是图书的编排、装帧、印刷和用纸,包括《瓦尔登湖》在内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可谓用心良苦,但这套与时局格格不入的丛书不但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而且后来居然被诬为一棵“大毒草”,这大概是徐迟绝对不曾想到的。

1949年,全国举行了第一届文代会,这是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北京的盛会。解放区的代表献出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里面收录的均是各位作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推出的作品。徐迟作为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徐迟当时的感觉是:“捧在我手上时,我艳羡不止。国统区没有拿出成套的作品来。其实我们的那一套《美国文学丛书》也是可以表现为人类文化的一笔遗产,编辑、翻译、印刷、出版也都是很有功力的,不过因为时间条件的不同,在那时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只好藏拙,不能拿出来了”^{[4]533-534}。初识梭罗时,徐迟是激动不已;翻译《瓦尔登湖》时,认为这是一本启示录;翻译完毕时,依旧觉得高高兴兴。但为何在第一届文代会上以及之后,徐迟却觉得《瓦尔登湖》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甚至还为此遭到了严厉批判呢?

要想得知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态度出现如此遽变的缘由,不妨回到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以及借助相关的译学理论进行分析。根据翻译研究之文化学派的想法,翻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文化改写和文化操纵^[11]，“改写”(rewriting)和“操纵”(manipulation)这两个关键词表明译语文化对于翻译实践能起到一定的利用和制约。那么,到底什么因素在操纵着文学翻译呢?安德烈·勒菲弗尔将其归结为三种力量在共同发挥着作用,那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整个社会文化处于“共名”^[12]状态的情况下,文学翻译主要以满足时代政治诉求为其目标导向,因此作品内在的思想性不但直接关系到某部作品能否得到译介传播,而且也成了对业已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进行衡量的重要指标。

解放之后,国内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文艺界盛行的是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建国后的前二十年里,我国固然没有出台过任何明确的翻译政策或翻译标准,但当时国家层面颁布的文艺政策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对翻译实践起到某种制约和规范,而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是筛选和介绍所谓“优秀”“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从以上所说的诸种因素来衡量,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显然并不具备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残酷及强化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以对抗西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对新中国进行遏抑和封锁的政治利用价值。而且从当时中美政治上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来看,之前中美联手打造的包括《瓦尔登湖》在内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遭到忽视、乃至被批评为“大毒草”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徐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所译《瓦尔登湖》现在受到极高的评价。但在那特殊时代,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说明徐迟对梭罗的认知还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毕竟,“如果译者的认识与译入语读者群体的意识形态不尽吻合”的时候,“作品又要经受来自接受环境的再次创造性叛逆”^[13]。

三、借他者言说自我:1980、1990年代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再次认知

1982年,徐迟对《瓦尔登湖》作了悉心修订,并增加了“译后记”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1984年,赴美实地考察瓦尔登湖及与美国有关学者进行交流后,徐迟对梭罗的《瓦尔登湖》产生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回国经多次修改后终于完成了一篇译序。1997年再版的《瓦尔登湖》就增加了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的“译本序”。如果把1982年版的“译后记”与1997年版的“译本序”进行一番对照,我们会发现:两者大同小异,只是后者增加了一个导言部分。

徐迟撰写的《瓦尔登湖》的“译本序”绝非草率之作,而是译者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才落笔形成的文字。《瓦尔登湖》因具备较大的影响被收录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该丛书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发起,徐迟受邀为入选丛书的《瓦尔登湖》准备一篇新的译序。徐迟极为重视译著新序的内容构架,不过书写新序的过程却是历尽波折。“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14]。只有等心灵完全安静下来之后,徐迟才完成了这个“译本序”。译序在译作中的地位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译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译序是译者在完成译作之后进行的自我批评,通过译序,读者可以了解译者的翻译感受,知晓译者对原著和作者的看法以及译者从何处入手强调作品和作者^[15]¹⁰⁹。对于徐迟而言,《瓦尔登湖》的“译本序”的确表明了他对梭罗其人和《瓦尔登湖》其书的体悟。对此,高晓晖说道,“这篇万字长文(指《瓦尔登湖》的译序)写成于他去世前几年,可视为他对《瓦尔登湖》钟爱一生的一个总结”^[9]。高晓晖固然说得不错,但徐迟在此总结的又何止是其对《瓦尔登湖》的终生爱恋呢。联系徐迟走过的坎坷人生,细心阅读这经过反复打磨的译序,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篇译序绝不仅仅停留在徐迟对翻译《瓦尔登湖》存在的得失进行总结的层面上,它更像是徐迟对自己一生酷爱的文学创作事业进行的深刻反思与委婉表白。

在译序的开篇伊始,徐迟如是说道:

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知所云。徐迟继而说道,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16]¹⁻²。

根据好友冯亦代的回忆,徐迟本人素日也喜欢沉思,喜欢沉思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前途,其情其形如同《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一样^[9]。综合徐迟个人的习性以及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在心灵完全宁静下来之后完成的这篇译序,似乎可以断定:徐迟是在借撰写译序的机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盘点。

徐迟一生中创作路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思想发生了两次突变。终其一生,徐迟被人评价为“属于一种‘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作家”^[17]。徐迟早年从事的是新诗创作,写的是那种抒发个人恋爱与梦幻的“明丽之歌”。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在完成《抒情的放逐》和《夏天的最后的玫瑰》后,徐迟与现代派分道扬镳,转而创作一些带着战火和硝烟的文字,从而实现了思想的左转。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徐迟一直“视自己的这个‘觉醒’是一次‘奥伏赫变’,一次‘自我革命’”^[16]⁵¹。在似乎是完成了一次思想信仰上的新生与飞跃的同时,徐迟却也终止了在文学上和现代主义道路上的另一些可能性的完成,放弃了对另一些彼岸的抵达。建国之后,文艺界强调文学创作从属于政治,为工农兵服务,诸如施蛰存、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因为感到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而过早地搁笔,终止了文学创作。徐迟虽然也曾有过短时间的困惑和矛盾,甚至是极其痛苦的抉择和挣扎,但他很快投入到了新的时代当中:“我想我怎么能不充当这一历史时期的记录员呢?并且,我又怎么能不为之歌唱呢?”^[18]¹³¹此时的徐迟,试图谨遵文代会的精神指引在作品中极力歌颂工农兵,但由于教条主义思想的限制,他在实际创作中“就似被废了武功的豪杰,形象思维的魔力完全失落”^[17]。对于在建国后至“文革”前这段期间

内徐迟的创作特点,我们可以用《新诗与四个现代化》中徐迟的自我告白来作为论证:“我离开了温柔的氤氲的镣铐和美妙的格律的束缚,而投入了宽大的散文的怀抱,写了一些激动的和愤怒的,主要是论战性的粗糙的东西”^{[16]67-68}。

晚年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岁月和反思一生的追求时,徐迟的话语中无处不显示着一种过来人将一切看透的苍凉。撰写长篇回忆录1949年之后的部分时,徐迟从建国讲起,差不多讲到文革前,但渐渐地这个回忆录越写越艰难。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然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他越来越对自己自1950和1960年代以来的生活、创作和追求产生了怀疑。徐迟的这种迷惘与怀疑在《在共和国最初的日子里——〈江南小镇〉续集》的开端表现得一览无遗:“我现在只好叹叹气,对你们说:我只是一个幻梦家而已!而如今我的幻梦全幻灭了……多么大的一个幻梦啊!随着是多么悲哀的一个幻灭”^{[16]68-70}。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徐迟也曾对自己一生的思想轨迹做过如此的剖白:“后来我也写了三四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学,而到晚年看法却又有变化了。发生了一次思想突变(‘奥伏赫变’)以后,而整个世界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99-100}。

1950年代徐迟虽然感到一些困惑和痛苦,但还没有晚年的这种幻灭感。晚年在劝诫后学时,徐迟总是现身说法地坦言:“不要写那些应景的作品,要写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文学是有自己独立精神的……不要学我一样,写杂了,把时间都浪费了”^{[19]369-370}。在一切即将尘埃落定的时候,徐迟开始苛刻地拷问自己,拷问灵魂,并怀着一种揪心的痛道出了或许是包括他在内的整整一代人无意或是无奈中所忽略的文学精神。1996年,从徐迟嘴里说出这样两段话,让人感到震惊不已:一是他说,“人要尊严地活,如果不能这样,就不如死”^{[19]372};二是回顾来时路,他总结出犯下的三个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不该选择文学”^{[19]372}。

对文学真正价值的体悟及对自己创作生涯作出的否定评价,自然会使得视写作为生命的徐迟感到幻灭,因为否定了写作,也就意味着否定了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次徐迟前往北京与好友冯亦代相聚,两人各自谈到了游瓦尔登湖时的所感所想。当冯亦代提到“悲凉”二字时,原本交谈甚欢的“徐迟默然者久之,却说我尘缘未泯,然后两人大笑了一场。我们盛赞梭罗远离市廛的决心,认为他真是个超凡绝俗之人,而我们即使有志,也难做到,怎能望其项背呢”^[10]?在梭罗孤独而又洒脱一生的对照之下,徐迟自然只有一份悲凉和无奈。早在1984年,在美国游览瓦尔登湖的时候,徐迟就曾声称,梭罗写作《瓦尔登湖》主要“对他自己的内心,作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自我探险”^[9]。其实,凭借撰写《瓦尔登湖》的译序,徐迟本人也进行了一次内心的自我审视。

在临终前不久完成的《瓦尔登湖》译序中,徐迟将《瓦尔登湖》称为一本静静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且“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14]2-4}。徐迟还看到了《瓦尔登湖》行文中存在变化的特点,比如书中有些篇幅属于“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14]14},而另外一些篇幅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14]14}。在这里,徐迟评析的其实分别是《瓦尔登湖》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的行文特点。无论是就梭罗本人,还是对《瓦尔登湖》的整体内容、语言风格以及《瓦尔登湖》在当下的意义,徐迟作出的评价都不可谓不高。但事实上,此时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作出怎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撰写译序,徐迟借梭罗和《瓦尔登湖》这把标尺来丈量自己的一生。如此看来,晚年的徐迟对于梭罗和《瓦尔登湖》颇具高山仰止之情,而对照自己,则是无限的沉痛和感慨。

四、结 语

徐迟和梭罗之间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译者和作者间的关系,但它又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文学作品

的语言转换这个层面。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肯定(初识梭罗、初译《瓦尔登湖》时的兴奋)——否定(建国后感觉《瓦尔登湖》羞于见人)——再次肯定(晚年对梭罗其人其作的极力赞扬)的历程,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也不是在经过了几十年后,徐迟对梭罗的认识再次回到了起点。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徐迟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态度尽管出现了阴阳两重天的巨变,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政治和个人双重因素的合力下,译者对作者和原作本身的体悟有所变动。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后,晚年的徐迟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且出国开阔了眼界之后,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认识出现了极大的飞跃。此时的徐迟对梭罗和《瓦尔登湖》欣赏依旧,但更多时候徐迟其实是在借梭罗和《瓦尔登湖》来巧妙地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

参考文献:

- [1] BAYM NIN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820-1865, Volume B, 6th ed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1792.
- [2]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81.
- [3] 许钧. 译道寻踪[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05: 35.
- [4] 赵家璧. 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M]// 赵家璧. 编辑忆旧.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5] 姚君伟. 徐迟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J]. 外国文学研究, 2005(4): 145-149.
- [6] 李宪瑜.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158.
- [7] 徐迟. 我的文学生涯[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8] 傅雷. 翻译经验点滴[M]//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626.
- [9] 高晓晖. 徐迟与《瓦尔登湖》的终生情缘[J]. 长江文艺, 2005(12): 60-63.
- [10] 冯亦代. 宁静的《瓦尔登湖》[J]. 读书, 1997(11): 52-53.
- [11] LEF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59-72.
- [12] 陈思和. 共名和无名: 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J]. 上海文学, 1996(10): 71-79.
- [13] 谢天振. 总序[M]// 谢天振, 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5.
- [14] 徐迟. 译本序[M]// 梭罗. 瓦尔登湖.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15] 大冢幸男. 比较文学原理[M]. 陈秋峰, 杨国华,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16] 徐鲁. 徐迟: 猜想与幻灭[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 [17] 古远清. 徐迟与现代派[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4): 152-159.
- [18] 徐迟. 《我们这时代的人》后记[M]// 王风伯, 孙露茜. 徐迟研究专集.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19] 周明, 向前. 难忘徐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杨文欢)